



何燕生

郡山女子大學宗教學教授

湖北省人，哲學博士。日本國立東北大學宗教學博士畢業並留校任教，博士論文曾獲得日本宗教學會「學會獎」，為該學會創立以來獲得此獎的第一位外籍學者。研究方向為東亞禪學思想史、近現代東亞宗教、日本佛教、道元禪學。專著有《道元與中國禪思想》（日文，法藏館），譯著有《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》（道端良秀著，商務印書館）、《正法眼藏》（道元著，宗教文化出版社）等。

近代禪學建構與現代化敘述：
關於人間佛教研究未來發展的思考



中日近代在禪學建構上表現出的最大特徵，是把「文本」作為唯一選向的「文本研究」範式。然而，令人特別饒有興趣的是，在這種「文本研究」範式中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普遍存在著一種所謂「現代化敘事」的學術傾向。比如，關於臨濟義玄的研究，臨濟有名的「呵佛罵祖」的言行，在胡適歷史學視域中被解讀為一種「方法」，認為臨濟的「喝」旨在破除偶像，並非反對理性；臨濟的「無位真人」、「無依道人」，在鈴木大拙、柳田聖山等人的禪學研究中，被看作是一種渴望「自由」的吶喊者形象，甚至被理解為試圖擺脫傳統「體制」的近代理性主義者。

本文擬對近代以來，關於臨濟及其《臨濟錄》的研究作為例子，對近代禪學建構中，表現在方法論上的「現代化敘事」傾向進行反省性檢討。其中，具體擬以胡適和柳田聖山的研究作為主要討論對象。同時期望通過本文的探討，能夠對人間佛教研究的未來發展提供一些思考。

胡適雖然涉及臨濟和《臨濟錄》的文字不是很多，但問題意識十分鮮明，而且胡適似是漢語禪學界最早從學術的語境論述臨濟禪的學者。至於柳田聖山，雖然在臨濟義玄思想的論述方面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鈴木大拙等人的相關研究的影響，但並不是「照著講」，而是「接著講」，體現了柳田本人的一種問題意識。柳田對《臨濟錄》中

出現的「普化」這位帶有符號性人物給予特別的關注，同一時期還對一休的《狂雲集》進行研究，在柳田的筆下，臨濟、普化和一休，似乎構成了柳田版的「現代化敘事」的一種符號——禪思想的「原型」。

胡適著手禪學的研究，也是始於上世紀二〇年代。上世紀二、三〇年代，中國學術界處於學問新舊交替的「改良」時期，對舊學進行「革命」，宣導新的學問。胡適從文學方面著手，撰寫了著名的《文學改良芻議》，反對八股，宣導白話國語運動。正是因為處於學問新舊交替的「改良」時期，胡適的學術研究的「現代化敘事」傾向顯得更加強烈，他對禪宗的研究，其實就是為了完成他撰寫一部「中國思想史」而展開的，應用性和目的性很強。這是時代的要求，學術上的需要，不僅僅是歷史學方法論層面的問題。他介紹禪學的方法，把臨濟義玄的「呵佛罵祖」視為一種「困學」的教學「方法」，其實與當時胡適所處的中國學術背景不無關係。而且，需要指出的是，胡適論述禪學方法的那篇講演稿《中國禪學的發展》，就是一九三四年胡適在北京師範大學，為學習教育的在讀學生撰寫而成的。

胡適在演講中曾明確指出，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這一派禪宗學人的方法與教學，對

於學習教育的人來說，多少也該有點啟示。①當然，胡適對「方法」的關注，是他長期以來的一項工作，不僅僅限於禪學方面。②總之，胡適把臨濟義玄的「呵佛罵祖」的言行視為一種「困學」的教學方面，對此我們需要結合當時的話語對象和時代背景去理解，去評價。與此同時，對於胡適始終強調通過歷史學的方法論以揭示禪宗的歷史，去其神話化，從而對日本學者「只是相信，毫不懷疑」的研究態度，持以批判態度，我們同樣也應該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去理解，去解釋，去評價。

臨濟義玄禪學，在歷史學家胡適的筆下，成為了一個現代化敘事的對象。在胡適看來，臨濟自始至終是一位歷史人物；其禪學，是中國佛教史中的一個「運動」，是一個可以解讀的對象；作為中國思想史中的一個「不可或缺的部分」，其禪學的出現，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；它的形成自有其歷史背景和思想脈絡，我們可以用歷史學的眼光去研究

註解：

- ① 柳田聖山編：《胡適禪學案》，中文出版社，一九七五年，第506頁。
- ② 關於該問題，小川隆在《語錄的思想史——解析中國禪》（何燕生譯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五年）一書第三章〈胡適與大拙——二十世紀的禪學〉中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論述，可參考。見該書第240頁—第246頁，日文版《語錄の思想史——中國禪の研究》第366頁—373頁（岩波書店，二〇一一年）。

它。

胡適認為，臨濟的偉大之處，在於他把「知性的解放視為中國禪的真正使命」；臨濟的「呵」等粗暴性言行，其實是一種「新的教學方法」，目的在於讓學人自己通過自己的努力，去發現事物的真相。胡適用「困學」一詞來表達這種方法。因此，作為一種「方法」的臨濟禪學，在胡適的歷史學敘事中被合理地表述出來了。儘管從佛教徒的眼光來看，胡適這種歷史學的禪學研究似乎缺乏同情心的理解，而鈴木大拙最不能認同的，似乎也是這一點。

與上述常盤和胡適不同的是，柳田聖山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禪宗學者。柳田擅長禪宗文獻的梳理，特别是在初期禪宗文獻的歷史研究方面，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重要成果。與此同時，柳田又是一位富有思想個性的禪宗思想史學者，他關於臨濟以及《臨濟錄》長達二十餘年的「尋夢」，可以說如實地反映了他在禪宗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奮鬥歷程。然而，正如上述常盤和胡適關於臨濟敘述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一樣，柳田關於臨濟和《臨濟錄》的敘事，我們同樣可以從中窺知其時代的影子。

柳田正式發表關於臨濟和《臨濟錄》的研究成果，主要集中在上世紀六〇年代至七〇年之間，但開始著手研究，似乎時間更早，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。他回憶自己研究臨濟的

動機時曾說：

將臨濟義玄（?-866）的說法與唐末五代河北這一特定歷史地理環境相結合重新進行解釋，我的這一祕藏多年的想法和方法，毋庸諱言，由來於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切為了抬高戰意的一種反省……（中略）鈴木大拙的《臨濟の思想》，執筆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先在《哲學季刊》上連載，後來至昭和二十四年，由中央公論社出版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鈴木大拙的臨濟解釋，是戰後民主主義的第一步，並不是什麼臨濟的思想，但與以前的傳統式訓讀相比，斷然新穎，我的臨濟研究，長期以來受到該書的影響。更者，大大地改變以前的傳統式訓讀的，是陸川堆雲的《臨濟及び臨濟錄の研究》。該書於昭和二十四年由位於長野縣岡谷的喜久屋書店出版。喜久屋是作者陸川堆雲居士的事業，位於信州味噌工廠的一角。我們反復地閱讀這本書，以擺脫戰爭中的咒符。臨濟以及《臨濟錄》，是人性解放的一種票據。③

註解：

③ 柳田聖山譯《臨濟錄》（中央クラシックス）中央公論社，二〇〇四年，頁1、頁7。

類似的文字，還見於柳田其他的著述。柳田說他結合河北的歷史地理環境，試圖重新解釋臨濟義玄，是出於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切為了抬高戰意的一種反省」，閱讀《臨濟錄》，目的是「以擺脫戰爭中的咒符」，而且還說，「臨濟以及《臨濟錄》，是人性解放的一種票據」等等。由此，我們不難知道，柳田關於臨濟的「自由理想人格」的敘事，其批判宋代臨濟禪的「格式化」，重唐輕宋，強調應該把臨濟義玄視為一個歷史人物，還原到唐末的歷史語境中去理解，其實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與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因此，臨濟義玄到底是不是一個「自由」的吶喊者，赤裸裸的「人」思想的表達者，不能不說多少也參雜著柳田對臨濟的一種想像；就像他評價鈴木大拙的臨濟解釋是「戰後民主主義的第一步，並不是什麼臨濟的思想」一樣。

柳田對臨濟義玄如此情有獨鍾，把臨濟義玄與有著戲劇性色彩的普化相提並論，是因為在柳田看來，臨濟義玄赤裸裸的「人」思想和普化的「瘋狂」敘事，其實反映了一種禪思想的「原型」。柳田的這一觀點，我們可以從《禪思想——その原型をあらう》（中央公論社，中公新書，一九七五年）一書中窺其一斑。該書雖然是一本小冊子，但從章名「鬮體の章」、「鏡の章」、「輪迴の章」、「風癲の章」這些文字，我們不難瞭解，柳田對於「禪思想」的理解，有他自己的特色。

在該書「風癡の章」中，柳田著重論述了作為「瘋癡的臨濟」和作為「瘋狂的普化」的形象，認為他們「破格」的言行，其實就是禪思想「原型」的一種赤裸裸的表達。^④「無拘無束」、「自由奔放」的臨濟和普化的形象，用柳田自己的話說，就是一個「去體制化」的「人」——「無位真人」、「無依道人」。柳田通過對臨濟的「尋夢」，找到了禪思想「原型」的存在。因此，柳田關於臨濟以及《臨濟錄》的一系列研究，可以說其實就是為了尋找禪思想「原型」的一次思想歷程。在這裡，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把臨濟的「呵佛罵祖」視為一種「方法」的胡適歷史學敘事的思想史論述的誕生；柳田的臨濟敘事，有他本人獨自的問題意識。

註解：

④ 柳田聖山譯《臨濟錄》（中央クラシックス）中央公論社，二〇〇四年，第163頁—第178頁。